

· 历史研究 ·

上川南抗捐军起义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探析

郑继怀¹ 罗燕冰² 黄先政¹

(1.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 2. 成都大学政治学院 四川成都 610106)

摘要:上川南抗捐军(后改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川康边地区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起义。文章对这次起义发生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作了详细分析。今天,我们探讨这段历史,对于深入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和挖掘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抗捐军起义;原因;影响;探析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4)06-0104-04

The Reasons and Influence of Shangchuannan Anti-tax Force Uprising

ZHENG Ji-huai¹ LUO Yan-bing² HUANG Xian-zheng¹

(1. School of Teachers'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China)

Abstract: The Uprising of Shangchuannan Anti-tax Force, which was reorganized as Chuankangbian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Guerrilla Force later, is an important armed uprising led by PCP during Agrarian Revolution in Chuankangbian area. The essay explores into its reasons and influence, which will help people memorize the little-known revolutionary history, cherish the memory of revolutionary martyrs, find a vivid textbook for the education on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and put socialist core value into practice.

Key words: Anti-tax Force uprising; reasons; influence; exploration

一、上川南抗捐军起义概述

1933年6月24日,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中共邛大特支(亦称邛大蒲县委)带领上川南^①抗捐军500余人,在四川邛崃王店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上川南抗捐军总司令部。中共党员孟光远任总司令,中共上川南特支书记余宏文(化名陈伯峦,下同)任政治委员,曾海云任特派员。之后,抗捐军先后在起义地王店、石头一带及蒲江、名山、洪雅交界的总岗山区建立根据地,并转战于邛崃、大邑、蒲江、名山、雅安、洪雅、丹棱等县进行游击作战,打击反动政权,队伍发展至千余人。1934年8月,根据省委指示,抗捐军改编为川康边^②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由上川南特支扩建后的邛大特区区委书记余宏文

任总司令。1934年秋,邛大特区区委书记在邛崃石头(今临济)建立了上川南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带领辖区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1935年春,在坚持武装斗争一年半之后,抗捐军起义在四川军阀的重兵进攻下失败。

二、起义发生的原因

追溯这段红色历史,其起义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横征暴敛,民不聊生

近代四川地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川西地区尤甚。据不

收稿日期:2014-06-27

基金项目: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课题“川康边苏区红色遗迹史料集成及保护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LQ2010b-17)。

作者简介:郑继怀(1954—),男,正处级督导员,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党的建设、教育管理。

完全统计,占四川地区人口2%的军阀、官僚、地主占有全省80%的土地^[14]。军阀们为壮大实力,疯狂扩展地盘、扩大军队。为了养兵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四川的军费从1912年的610万元(银元,下同),到1934年的9000余万元,22年间增加了约15倍^[14]。四川实行田赋预征,一年数征,有的地区竟预征到几十年甚至100年以后^[14]。当时,川西地区捐税之多,税赋之重在全川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军阀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造成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繁重的捐税,频繁的战争,兵灾、匪祸、饥馑,使百姓大量逃亡,四川全省人数急剧下降。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全省有7263万余人,到1931年只有4780万人,四年间减少2000多万人^[14]。许多地区田园荒芜,满目凄凉。据载,1933年时,邛崃境内的田赋已预征到1959年。加上官僚、地主豪绅的盘剥,老百姓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据记载,邛南石头郑尚清的媳妇,因无钱缴纳苛捐杂税,被逼上吊而亡;夹关刘沟许甫廷,被重租与捐税逼得逃亡他乡,儿子饿死,妻子改嫁。这类现象在当时的川康边地区数不胜数,血淋淋的现实,使广大农民对军阀统治十分不满,积蓄着强烈的反抗情绪。

2. 邛崃地区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

鸦片战争以来,邛崃地区爆发过一次次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从1911年7月,邛崃民众响应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起的“破约保路”运动,成立邛州保路同志会,踊跃参加反对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两路建筑权的斗争,到1921年邛崃反捐税斗争中,太和农民李现文率领烟农用大刀、长矛和鸟枪打败收捐军队的每一次斗争,都充分显示了邛崃人民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五四运动以来,四川地区的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邛崃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迅猛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大解放,为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3. 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对领导武装起义起到决定性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川西地区的革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23年秋天,四川革命运动的先驱王右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成都建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15]。成都地区的党组织建立初期,虽然力量单薄,缺乏经验,但他们一经诞生,都义无反顾地遵循中央的方针,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领导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向军阀、官

僚、地主豪绅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党的六大以后,四川省委根据六大关于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精神,在邛崃、大邑地区有效地开展宣传和引导群众的工作,使这一地区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反对军阀、地主预征粮为主要内容的斗争,逐步发展为武装抗捐,开展游击战争,直至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2]。1927年10月,中共党员洪海帆受中共川西特委派来到邛崃,在张志和(邛崃人,后经洪海帆介绍加入中共)任旅长的二十四军第二混成旅中秘密建立中共邛州军支,这是党在邛崃开展活动的开始。邛州军支在邛崃开展的兵运、学运工作作为邛崃地方党组织的建立积蓄了后备力量。1928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派游少彬到邛崃建立中共邛崃特支,党在邛崃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正式建立。1928年夏秋,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邛崃西部的何家、火井,南部的道佐、王店、夹关、平落、石头,城郊的孔明、白鹤、西河一带相继组织了秘密农会,开展反军阀预征粮款的斗争。这次震动全川的反预征粮款的斗争,虽然在军阀的镇压下受挫,但却为邛崃地方党组织之后领导的武装抗捐斗争作了铺垫和酝酿。1932年春,四川省委派宋其康到邛崃建立邛大特支(亦称邛大蒲县委),这一期间,邛崃地方党组织得到较大发展,南路的王店、郑店、王营等地,党的工作十分活跃,为发动起义准备了充分的组织条件。邛大蒲县委以及之后建立的中共上川南特支、邛大特区区委,在历时一年半的上川南抗捐军起义、建立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4. 两大主力红军相继入川建立根据地给邛崃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1932年以前,川西地区革命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但是,1933年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进入川北,于1933年2月在通江县城建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权,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2月,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进入川东南,与红六军团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入川后,在1932年12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就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拥护红军入川的特别通知》,要求“领导贫民开仓分粮,发动游击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以实际行动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入川”。此后又多次发出类似指示,提出同样要求。从1933年1月至1935年6月

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主力红军入川以及两大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四川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加强,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曾经一度沉寂的成都地区革命斗争也再度发展起来。有了主力红军和两大苏区作依托,以及川北红军胜利的鼓舞,极大地振奋了邛崃民众的士气。在此形势下,邛崃地区党组织明确地执行了以武装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支援两大根据地发展的方针,加快了发动武装斗争的步伐^{[1]28}。

5. 川西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川西地区地处四川盆地边缘,俯瞰成都平原,背靠邛崃山脉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山地、森林面积在80%以上,地形地貌复杂,可进可退,为发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另外,由于四川军阀长期争战,据地自雄,对防区外的事大多不闻不问。而川西地区分别为刘湘、刘文辉、李家钰、邓锡侯等的防区,被划分为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上述原因,为抗捐军起义后,能够长期辗转于各军阀所辖的邛崃、名山、蒲江、芦山等数县境内,并在名山、洪雅、蒲江交界的总岗山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是抗捐军起义后期,虽遭受四川军阀的重兵进攻而能够长期艰苦转战于邛崃王店、石头及总岗山根据地一带,并屡挫敌军,震动川西的重要原因。

三、起义的影响

上川南抗捐军是党创建和领导的一支典型的由农民武装抗捐发展到建立红军游击队,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人民武装^[3]。抗捐军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四川地区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起义,为党领导农民武装抗捐,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直至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次大规模农民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为四川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沉重地打击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

抗捐军起义后,省委派中共上川南特支书记余宏文、省委委员曾海云(化名张守恒)、邛大蒲县委书记侯剑秋(化名朱建文)等相继到抗捐军工作,使抗捐军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游击队伍不断壮大,有效地打击了游击区的土豪劣绅。在邛大特区苏维埃政权的带领下,苏区群众纷纷开展抗捐抗税、惩办土豪劣绅、分田分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据载,四川军阀对抗捐军起义十分恐慌,认为:虽属“星星

之火,深恐为燎原之势,再演成通南巴之惨剧”,先后出动正规军和10余县民团对游击队进行轮番“清剿”,游击队在反围剿中多次取得胜利,曾一度攻占邛南重镇夹关及名山车岭镇。抗捐军连战连捷的消息,很快传到成都、重庆等城市。成、渝两地的报纸上,诸如“邛名孟匪光远,正在赤化川南”等标题,就醒目地刊载头版^③。从1933年11月到1935年春,游击队在给养困难、枪弹缺乏的情况下,仍艰苦转战于绵亘200余里的邛(崃)、蒲(江)、名(山)等县山区,坚持斗争一年半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

2. 有力地配合了两大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主力红军的反围攻斗争

两大主力红军相继入川建立根据地,使四川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加强,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政权及四川军阀的恐慌,他们调集重兵对两大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妄图将苏区扼杀于摇篮之中。邛崃地方党组织响应中共四川省委号召,及时发动了上川南抗捐军起义。以王店、石头为中心,覆盖邛(崃)、蒲(江)、大(邑)、名(山)、芦(山)、丹(棱)、洪(雅)、雅安等上川南各县的武装游击区的开辟,以及上川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以邛(崃)、蒲(江)、名(山)三县交界地为中心,纵横上川南各县山丘地带,幅员纵长七十余里,横广六七十里的大地区,成为红色区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这次起义,达到了扰乱敌人后方,牵制部分敌人兵力,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敌人围攻苏区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反围攻作战。

3. 为四川地区武装起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示范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较早地在邛崃建立了地方组织,为开展武装斗争准备了革命力量。1933年6月爆发的上川南抗捐军起义,使这里成为川西地区武装斗争策源地。上川南抗捐军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四川地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继续和扩展,从而在四川武装斗争的历史上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抗捐军起义前,从1928年4月的南溪起义到1933年4月的苍溪三堆石起义,党在四川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有20余次。抗捐军起义后,四川地区又先后发生了崇庆怀远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上川南抗捐军起义及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四川省委和邛崃地区党组织在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建设方面的探索

和实践。这次起义,在四川的土地上播下了红色的火种,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书写了一首悲壮激烈的战斗史诗^[4];在四川地区革命斗争史中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将永载史册。

注释:

- ① 上川南,泛指乐山以北,威远、仁寿以西,邛崃、雅安以南的广大地区。
- ② 指夹金山以南,二郎山以东,川西平原以西,大相岭以北地区。
- ③ 见中共邛崃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中国共产党邛崃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2005:52。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川滇黔地区)[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 [2]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图志(第一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68.
- [3]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成都市组织史资料(1922—1993)[G].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28.
- [4]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1923—1949)(第一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72.

本课题研究期间,在实地考察及资料核实等方面得到邛崃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责任编辑 燕朝西]

(上接第97页)

- [5] R. Jacobson. 语言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M]. 何林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90.
- [6] Van Leeuwen, T. *Speech, Music, Sound*[M]. London: Macmillan, 1999: 214.
- [7] Baldry, Anthony, Thibault, Paul. *Multimodal Transcription and Text Analysis* [M]. London, Oakville: Eynix, 2006: 165—268.
- [8] Scollon, R. *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A Study of News Discourse* [M]. New York: Longman, 1998: 145—150.
- [9] Norris, S. *Analyzing Multimodal Interaction: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M]. London: Routledge, 2004: 129—135.
- [10] Norris, S. Multiparty interaction: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on relevance[J]. *Discourse Studies*, 2006, 8(3): 401—421.
- [11] Jewitt, C.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multimodality[C]//C. Jewitt.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alysi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b: 28—39.
- [12] Forceville, C. *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34.
- [13] Forceville, Charles. *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M]. London: Routledge, 1998: 204.
- [14] 辛志英. 话语分析的新发展——多模态话语分析[J]. 社会科学辑刊, 2008(5): 208—211.

- [15] Forceville C. J. and Urios-Aparisi, E. *Multimodal Metaphor*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9: 19—45.
- [16] 束定芳. 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目标与内容[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 [17] 晋小涵. 语言研究的新发展——从生物语言学到神经语言学的嬗变[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 [18] 黄立鹤,何继红. 从《Routledge 多模态分析手册》看多模态语言研究[J]. 语言教育, 2013(1): 92—95.
- [19] Tracy, K. Discourse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C]//D. Schiffrin, D. Tannen & H. E. Hamilton.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725—749.
- [20] 刘靖. 传播生态学视域下的外语学习模态[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99—106.
- [21] 陈力丹,王亦高. 论图文关系的历史变迁——以柏拉图式的图文观为先导[J]. 现代传播, 2008(4): 14—17.
- [22] 董敏. 论社会符号多模态分析的哲学意义[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4): 43—46.
- [23] 刘芹潘,鸣威. 理工科大学生英语口语多模态语料库构建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 2010(4): 69—72, 119.
- [24] 李辉,陈玉秀. 基于口语语料库的非英语专业与英语专业学生连接语使用状况的对比研究[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

[责任编辑 肖 晗]